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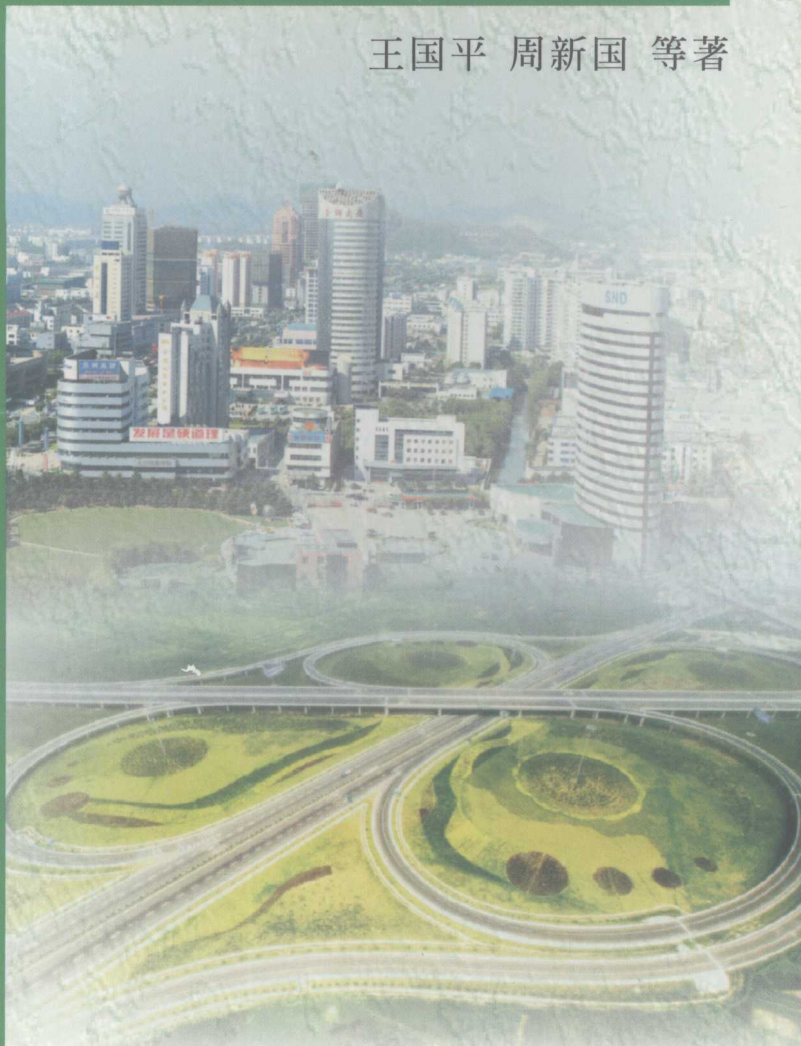
苏南发展
研究丛书

江苏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历史进程研究

王国平 周新国 等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UNANFAZHAN
JIUCONGSHU



江苏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历史进程研究

王国平 周新国 等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苏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历史进程研究/王国平等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1137-147-5

I. 江… II. 王… III. 经济史-江苏省 IV. 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8907 号

江苏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历史进程研究

王国平 周新国 等著

责任编辑 张 凝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胡桥镇 邮编:212313)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6 插页 4 字数 412 千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7-147-5 定价:3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江苏现代化启动的历史特点(代前言)

学术界对于“现代化”一词的概念与含义有着多种不同的界定与表述。按照罗荣渠的定义,“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的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①近期出版的马崇明著《中国现代化进程》对现代化概念也有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概念,它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一种社会变迁,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演进,具体地说现代化表示的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质量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这样一个急剧转变的动态过程,它包括了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信息化,价值观念的理性化等。”^②本文正是从这样的历史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② 马崇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角度出发,探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及其影响。

中国是一个大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区域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区域现代化发展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对各个区域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若干现代化先行区域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成为现代化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由于晚清中央政府的衰弱和权力下移,由于民国时期地方政权的割据和中央政府控制力的相对薄弱,对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其重点往往是,也应该是对中国若干现代化先行区域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

一、率先启动的区域现代化

关于现代化起点问题,“一般认为,产生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领域里的‘产业革命’,政治领域里的‘市民社会’,文化领域里的‘现代思想’的形成,是现代化在世界史上的起始点”。但正如日本学者十时严周所说,“这种观点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等术语的运用标准因人而异,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用不很明确的其他同位概念来解释现代化概念,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其二是即使对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有了一般性定义,但是除了西方国家及若干非西方国家外,其他国家并没有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连续过渡。目前许多低发展国家显然没有经历这种连续变迁。因此,坚持这种观点无异于将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排除在现代化现象之外。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设定关于现代化起点的跨文化标准”。“当人们寻找跨文化的、具有可比性的关于现代化起点的明确标准时,关注工业化概念是很得当的”。

十时严周主张“将向工业化过渡和现代化起点二者合一”,这样做的合理性和有益之处在于:第一,“为我们具体分析每一个社

会在受到同一机械力以及机器生产方式即同一要素的影响后的社会变动过程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对引进的机械技术如何影响各个社会的分析把握社会变化。我们不仅能从概念上区分在机器生产方式这一世界史上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共同变化过程和输入国个别的生活方式差异所带来的特殊变化过程,而且能对这两者进行统一分析,这将成为我们进行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统一的方法论的基础”。第二,“可以通过深刻地分析在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所产生的各种变化,来展开对现代化诸过程的经验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找出了跨文化的、具有一定共同性的倾向,我们就可以分析出它所代表的是哪一领域的哪一种倾向。找到了明显的个别变化过程,我们就可以从客观事实出发,以实证方式研究它是在何种状态下出现的何种个别变化。”据此,十时严周提出:日本“向工业化过渡的起始点当在江户时代幕府以及西南雄藩引进西洋军事工业时期”。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在这一时期根植于日本。^①

按照这样的分析,中国向工业化过渡的起点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发轫,其主要历史背景则是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与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

从明清之际开始,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当时的文化交流并未触动中国人形成现代化的取向。相反,倒是中西之间的“武化”交流更易触动中国思想界的思考。鸦片战争使中国人见识了西方舰船枪炮现代武器的威力,现代热兵器在中国的使用宣告了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终结。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1840年9月24日,林则徐

^① [日]十时严周:《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的标准设定》,[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译:《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2页。

虽已“奉旨革斥”，他仍在一份奏折中明确向朝廷建议，“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①。清政府大量向外国购买武器则由太平天国战争而推动。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在创办湘军水师时就开始购置西方火炮。水师船只共配置火炮千尊，其中许多是西洋火炮。^②如丁日昌所说，“中国自遭贼扰以来，采买外国军火”，自曾国藩“开其端”。^③清军江南大营在这方面较湘军并不逊色。据两江总督何桂清函称：“近年长毛打不过官兵者，为带兵官以及兵目勇头皆有洋枪也。（每人有带至二、三十杆之多，每杆自一响以至六响。）”^④

太平军在这方面也不落后。1860年5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干王洪仁玕与忠王李秀成提出东征苏州、常州、上海，并提出：“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⑤太平军的直接军事目标之一，就是购买20艘西方舰艇，使太平军水师现代化。由于太平军未能攻克上海，建立现代化海军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太平军占领苏南后，由于接近上海，方便了与洋人的贸易，增进了部队的现代化水平。1862年天京会战期间，李秀成部已拥有较多的洋枪洋炮，湘军将领曾国荃的面颊就曾被洋枪子击伤，太平军还用“西瓜炸炮”轰击曾国荃部营垒。1863年，美国人白齐文带了一批洋人投到苏州太平军慕王谭绍光的麾下，并训练太平

① 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5页。

② 曾国藩：《复吴甄甫制军》，见李瀚章编：《曾文正公（国藩）全集·书札》第4卷，光绪二年传忠书局，第23页、第30页、第37页。

③ 丁日昌：《附洋报效机器铁厂》，《丁禹生政书》（上），志濠印刷公司1987年版，第176页。

④ 江苏师院历史系等：《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⑤ 《洪仁玕自述》，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4页。

军使用洋枪、洋炮,使太平军受到西方近代化军事训练。据白齐文部下马惇所说,他所见到的太平军部队,有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枪与来福枪。^①

因为太平军中使用洋枪、洋炮的数量与日俱增,故护王陈坤书的兵册记事簿中有“本阁送双响洋炮一条交洋炮官修整”^②的记载。既然太平军的部队编制中有专门修理洋枪、洋炮的洋炮官,便应有规模或大或小的修械所。事实也正是这样。据记载,当时昆山“城内有制造大炮、炮弹和开花弹的军火厂,由两个英国人经营”。正因为如此,英国史学家认为,“昆山对太平军斗争事业的重要性,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③。1863年6月,洋枪队与清军攻陷昆山,这使太平军遭受巨大损失。董蔡时先生这样评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太平天国内部也已经开始了‘洋务运动’。”^④太平天国的失败使太平天国的早期现代化止于青藓之末。

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起直接作用的是清政府中洋务派推行的洋务活动。

1862年,李鸿章任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上海洋炮局。1863年底,淮军攻占苏州,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将上海洋炮局迁至苏州(江苏巡抚驻节苏州),改称苏州洋炮局,购入一些西式机器设备,为淮军制造武器弹药。同年底,清政府解散所谓“阿思本舰队”,苏州洋炮局买下“阿思本舰队”从英国带来的修造枪炮的机器,提高了生产能力。仅炮弹一项,每周可生产1500发至2000发。苏州洋炮局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的军事工业。

① 王崇武、黎世清:《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73页。

② 金毓黻、田余庆等:《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7页。

③ 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7页。

④ 董蔡时:《曾国藩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

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两江总督驻节南京),又将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加以扩充,成为金陵机器局。

比苏州洋炮局与金陵机器局更为成功、更具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取得上海“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精最大者”美商旗记铁厂(该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①,与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这两个洋炮局尚未使用机器)合并,加入容闳从美国购买的机器,成立江南制造总局。该厂最初计划以造船为主,后以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为主,同时也造船、炼钢以及制造简单机器。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大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其原因如李鸿章所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

由上可见,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产生的主要背景是:西方现代武器在中国的使用与机器的输入;清政府与太平天国战争的推动;面对西方列强,清政府“自强”的需要。

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点是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这已基本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正如罗荣渠所说:“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强运动。”^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研究中国区域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时候,特别是研究江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时候,应该突出强调的是,所有标志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起点的经济历史事件,包括苏州洋炮局、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等,全部发生在当时的江苏,在这个意义上说,江苏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同一的,江苏是中国区

① 丁日昌:《附详报效机器铁厂》,《丁禹生政书》(上),志濠印刷公司1987年版,第177页。该铁厂由海关通事唐国华等集资购买报效。

② 宝璽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九年影印本,第10页。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域现代化率先启动的地区。在中国区域现代化过程中,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应该说是历史的启迪与历史的使命。

二、现代化启动的社会经济基础: 相对农业剩余

江苏省域的前现代社会基础如何,它与中国其他省域的前现代社会基础有何不同?相对整个中国的前现代社会基础而言,它有没有特殊之处?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探讨。

英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表明,英国工业化的启动、乡村工业发展和繁荣的深层原因是“拥有足够储蓄率的农业及富庶的个体农民,后者为工业提供了资金、技术和企业家”。“一个农业国家,如果生产不出足量剩余的农产品,也就生产不出一个工业世界”^①。在早期现代化研究中,传统农业发展水平是前现代社会基础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早期现代化启动之前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水平,学术界已有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对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作了比较研究,认为“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呈下降之势”^②。据侯建新推算,19世纪江浙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为1 067.5公斤/人,“英国农民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为1 184公斤/人,15~16世纪为2 760公斤/人。……19世纪初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比英国13~14世纪的还低;比英国15~16世纪的低60%以上”^③。

①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② 李根蟠:《关于明清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戴逸先生估算,“到18世纪之末,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达2040亿斤,以全国人口3亿计,人均占地3.5亩,人均粮食680斤,如果扣除饲料、酿酒、制酱等用途,人均口粮约600斤(皮粮)”。“18世纪的农业能够养活达3亿之众的人口,其总产量和亩产量都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水平也是很高的”。^①有些专家说,“清亩产比宋提高了1倍左右……明清时期由于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人口的增加使社会剩余总量有所增加,为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②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认为:“中国的农业于18世纪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之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③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水平是否提供了农业剩余,史学界几乎一致持肯定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在十八世纪时,清帝国的领土比前一朝代扩大了一倍,人口增加了一倍,即几乎是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而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欧洲。国家处在繁荣安定的鼎盛时期。”^④直至清朝末年,中国农业一直“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⑤,具有潜在的经济剩余。“传统农业所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明清农业生产在广度方面有颇大发展,社会剩余总量增加,也提供了商品经济

① 戴逸:《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② 樊卫国:《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学术季刊》2002年第2期。

③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④ 蒋永清:《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性》,《湖湘论坛》1999年第3期。

⑤ 费维恺著,杨品泉译:《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继续发展的基础。”^①

关于这样的农业剩余能否支撑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史学界则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不断增长、人口增加、交通改善、‘粗放式’的商业化过程四处扩散等等……一种将传统社会推向近代社会经济成长的突破性变化即可发生。”^②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命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特征出发加以考察。通过对晚清的农业、商业的发展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这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③据研究,中国历代政府大都采取轻田赋的财政方针。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保持庞大官僚国家机器的运行,而没有增殖国富的概念。明清田赋供政府的粮食只占粮食总量的5%~10%,政府收入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而北京中央政府所得到的那部分实际约占3%。这一方面说明,政府未能掌握足够的农业剩余与经济力量以启动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国家收入所占的份额甚小……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的相当巨大的潜在的经济剩余一直没有被用于发展方面,因而从根本上束缚了工业化的启动。”^④亦如戴逸先生所说:18世纪的中国“也存在着近代因素,但幼嫩稚弱,阻碍重重,不能够加快积累和汇聚,还远远不能够冲破中国封建社会的桎梏”^⑤。

① 李根蟠:《关于明清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金鹏:《农业剩余: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对晚清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③ 金鹏:《农业剩余: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对晚清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④ 蒋永清:《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性》,《湖湘论坛》1999年第3期。

⑤ 戴逸:《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本文赞同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前夕,中国传统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产生一定的农业剩余;但这样的农业水平与农业剩余尚不足以支撑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全面启动。

然而,我们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各区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个别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域,其农业剩余与经济剩余的发展水平对于工业化启动的影响,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江苏就是这样的省域之一。

第一,江苏特别是苏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相对先进的地位。

明清时期,苏南已经拥有发达的农耕文明。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苏南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人烟辐辏,市廛兴旺。”^①“伴随着以苏州丝织业、松江棉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发展,苏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形态,使生产力得到明显提高,加之原料产地和手工业作坊地域分工的形成,商品经济在苏南地区也获得了空前发展。”^②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化有重大进展。饶济凡估计清初江苏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以苏南为核心地带的江南城镇人口所占比例更高。不少专家认为,“1850年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外的整个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仅为1860年松江府的水平(15%),然后再加上三大城市的人口(约占江南总人口的5%),那么江南城镇人口的比重应当在20%左右。”这个估数和刘石吉所作的估数一致。^③

① 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

② 任桐:《晚清苏南改良思想群落的地域成因》,《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③ 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农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李伯重著文揭示:嘉靖后期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已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①康熙年间靳辅的《生财裕饷第一疏》称:“是十人之中,农民仅居其五,而土工贾与异端游惰之民,以及异端之工贾,亦居其五。”^②道光年间,江南东部“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③。“这些估计可能有所夸大,但是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农村非农人口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而且不断增加,则是可以肯定的。”^④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所反映的并不是“人多地少的矛盾”,而是农业和农业剩余的水平。如蒋兆成所指出:“农业是带动江南经济由自然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根基,而当时农业的发展不是凭借生产工具的改进,而是依恃农户对传统工具的更完备配置以及农户之间更普遍的互相协作,人们更注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注重把单一的粮食经济结构转向多种经营的经济结构,以至形成了扬长避短的专业性经济区域,它们把生产指向市场,培植了市场的发育,反过来又使上述变化趋势更走向常态和有序,二者互相

①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史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页。

② 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道光七年刻本,第26卷,第18页。

③ 林则徐:《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3页。

④ 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促进,互为制衡。”^①

第二,江苏的传统农业特别是苏南的传统农业提供了相对较多的农业剩余。

据靳辅调查与估算:“夫天下之民,求其乐岁有余,凶年有备,全在力农者之多于土工贾。故十人之中,科农民七,而土工贾三。良以农民七人,所获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余粟三分五厘,以售土工贾,而土工贾亦须止食其三分,尚可余半分之作为储积也。”而“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止可种稻田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则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准古证今,原无异也。至农夫五等,牵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七人,内除本夫与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约共食其半,计可余一半,以食他人”^②。嘉道年间,包世臣也作过这样的推算:“苏州共辖九县,为天下名郡,然合九县之境,南至平望,北至望亭,西至广福镇,东至福山,截长补短,不过方百七十里。名城大镇,山水所占,五分去二,得产谷之土方百三十里。每方一里为田五百三十亩,方百三十里共计田九百十万亩。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当岁产米二千二三百万石。苏属地窄民稠,商贾云集,约计九属,有人四五百万口,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是每岁当食米一千四五百万石。加完粮七十万石,每岁仍可余米五六百万石。”结论

① 王日根:《明清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读〈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② 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道光七年刻本,第26卷,第17页。

是：“五年耕而余二年之食。”^①上述估算不一定非常准确，^②应该说，当时人的记载还是可以基本上反映当时情况的。

第三，江苏的传统农业特别是苏南的传统农业提供的农业剩余支撑了区域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一般说来，尽管有学者认为，就全国范围而言，“我国农民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少，甚至可以提供启动近代化过程或制度创新过程的某种基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难以认可，如李根蟠所说，“这种剩余，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集中到地主及其国家的手中，大部分用于奢侈性消费，能够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是很少的。”^③然而，就个别区域如江苏特别是苏南而言，情形就可能不一样。“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是江南，它是当时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明清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江南这样的发达地区之外，还存在广大的落后的封闭的地区。”^④这些论点几乎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中国与江苏现代化的历史也已表明，江苏的传统农业特别是苏南的传统农业提供的农业剩余支撑了江苏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应该指出，中国现代化在苏南的最初启动，是清政府地方当局推动的结果，是对近代军事工业投入的结果。其最初的资金并不限于江苏与苏南的农业剩余，而是依赖政府与地方当局的多方筹措。但是，上述情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区域现代化启动中，当民间企业创办和发展之时，苏南有可能走在其他区域的前面。

① 包世臣：《齐民四术·农二·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光绪十四年刻本，第6卷，第3页。

②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③ 李根蟠：《关于明清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④ 李根蟠：《关于明清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还应该指出,无论中国的还是江苏区域的传统农业相对欧洲现代化启动之际的农业而言还是落后的。中国的和江苏区域的农业剩余是建立在高额租赋和低下的农民生活水平基础上的相对农业剩余。这样的相对农业剩余既支撑了现代化的启动,又制约了现代化启动的水平。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时期中,中国和江苏的区域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有赖于过大的剪刀差和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对低下。

三、现代化启动的区位优势

《清史稿·地理志》云:“江苏:《禹贡》扬及徐、豫三州之域。”“明为南京。清顺治二年改江南省,设布政使司,置两江总督(辖江南、江西,驻江宁……)及江宁巡抚。(治苏州……)”顺治十八年(1661),分九府四直隶州属安徽。康熙元年(1662),分建安徽为省治,置巡抚。康熙六年(1667),江南省更名江苏省,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统江宁、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扬州、淮安七府及徐州直隶州,基本奠定了清代江苏的幅员与区位:“广九百五十里,袤千一百三十里……京师偏东五分至五度三分。”^①长江下游、东海之滨,江海交汇之处。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江苏所在历史区域的区位特点与优势在于:与中原地区不远不近的距离,以及与之相关的较为优越的历史环境。说不远,是因为它靠近中原地区,易于接受中原地区先进发展水平的辐射,以促进本区域的发展。说不近,是因为这一距离使它经常处于中原逐鹿的战乱之外,易于保持相对安定的环境,以保障本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一区位特点自唐中叶以后更显现出对本区域发展的影响。前现代的江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之所以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八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83~1984页。